

宰相・困境・家園：

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其陶潛巡禮

許東海^{*}

摘要

李德裕歷史上宰相以辭賦書寫展開陶潛巡禮的首要案例，並以歸園書寫及其陶潛對話，展開南楚罷相期間的心靈顯影及其情志見證，不僅為唐代史學有關他此一初次罷相時期的情志脈動，提供彌補空闕的書寫扉頁；另一方面就唐代文學史或田園書寫史而言，亦提供一則別具參考價值的辭賦案例，從而映現唐代賦學與史學互涉的深層文化意蘊。

關鍵詞：唐代、宰相、李德裕、辭賦、陶潛

^{*} 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唐代文士慕陶書寫與李德裕之訪陶巡禮

南朝鍾嶸《詩品》首度揭示陶淵明「古今隱逸之宗」的崇高歷史典範，這一當代文化冠冕固然提高陶詩的學術地位，然而時人對於陶淵明的關注焦點則主要集中在其隱士的文化身份，故今見史書如《宋書》、《晉書》、《南史》載敘其傳者，皆歸置於〈隱逸傳〉之列，顯然相對於陶淵明之詩品位階，更熱衷於其人品之高風亮節，¹故即使如鍾嶸、蕭統等當代獨具慧眼且賞譽陶詩的重要人物，亦不免藉文章闡人德展現其如出一轍的陶淵明論述，如鍾嶸既稱「每觀其文，想其人德。」而蕭統亦謂「余愛嗜奇聞，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當時陶潛與周續之、劉遺民並稱「潯陽三隱」，²亦為重要的歷史具體註腳，故從南朝《詩品》以陶潛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定位，流衍迄於唐代，陶詩固然已淺漸成為唐代田園一派詩人奉若圭臬的宗師，然其慕陶與效陶的精神依據，仍集中體現在其人德高風與隱逸情志的書寫旨趣之上，其中白居易〈效陶體詩十六首〉可為其中代表，³數年後，白氏因遊廬山，途經陶淵明舊里，遂因「思其人，訪其宅。」而有〈訪陶公舊宅〉詩，然則白居易誠為中唐慕陶與訪陶的首要代表詩人。

與白氏大體同一時代，並曾相互交遊的中唐宰相李德裕，則亦屬慕陶與訪陶之倫，然其異於白氏者，主要有二：（一）李德裕的慕陶與訪陶之作，主要撰寫於其首度罷相的南楚謫放期間；（二）李德裕的陶淵明追憶，乃以辭賦展開，異於白居易等唐代文士主要以詩歌慕陶、效陶的文類取向。⁴陶淵明傳世詩文集中，詩歌達百首以上，而辭賦惟見〈歸去來辭〉、〈感士不遇賦〉與〈閑情賦〉等三篇，故就陶集中文類數量的客觀懸殊而言，唐代文士誠然以詩歌展現其慕陶、效陶的書寫之旅，固得其宜；相形之下，唐人以辭賦展開與前賢陶淵明的古今對話，則屬罕見，卻也彌足珍視。故就此一面向而言，隋末唐初王績固不乏以〈遊北山賦〉流露慕陶之心靈歸向，展現田園隱居的人生圖景，開啓唐代辭賦陶潛巡禮的扉頁，其次，中唐顧況〈莽墟賦〉融鑄陶氏〈桃花源記〉的理想國度及其書寫身影，允為王績之後，以辭賦寓託慕陶情志的重要作者。由是觀之，自唐初迄盛唐前後王績與顧況應為罕見以辭賦書寫展開慕陶巡禮的代表詩人，二人亦不乏與陶潛同樣具有往復迴旋於仕、

¹ 參見王國瓚：《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29-33。

² 參見〔梁〕沈約：《宋書·周續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93，頁2280。文人謂：「（續之）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³ 參見〔唐〕白居易：〈訪陶公舊宅·序〉，《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362。序文謂：「予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川閒居嘗有〈效陶體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⁴ 按傳世白居易集雖未見白氏與李德裕酬酢唱和之師，惟二人之間應曾有所往來，並有所唱和，後或因朝廷黨爭之故，白氏遂於編纂詩文集時刪除之。

隱之際的人生閱歷，故其詩文集中除與白居易等一般唐代文士以詩歌書寫體現慕陶心靈外，復別闢蹊徑地以辭賦展開另一側面的慕陶對話。其中東臯子王績固以山水田園逍遙之遊，及其醉鄉隱逸之姿，成為初唐慕陶的首要代表人物；而盛、中唐之際的顧況，則以〈莽墟賦〉重現陶氏筆下的理想國度桃花源，並作為諷諭時世與撥亂反正的精神寓託，⁵然則唐代辭賦之慕陶書寫，首推王績〈遊北山賦〉，惟其賦開風氣之先，大體則以闡揚陶氏歸返自然，遨遊醉鄉為主要旨趣；相形之下，盛唐前後的顧況〈莽墟賦〉雖再現陶潛筆下的桃花源圖景，卻同時浮現當代諷諭的古詩身影，顧況慕陶與諷諭相互競合的書寫特色，成為唐賦慕陶書寫，由承傳到變創的重要轉捩。

唐代名相李德裕是中、晚唐史學研究的重要人物，平生功業政績固然受到矚目，但因他又是當時牛、李黨爭的關鍵首腦，而朋黨與藩鎮、宦官又是牽動唐代後期政局的歷史指標與主要變數。⁶儘管李德裕本身未必有意形成朋黨對峙的政治局面，⁷但作為當代牛、李黨爭的風雲人物，終竟無法脫身於黨爭傾軋的政治漩渦之外，並且加上與宦官勢力彼此糾葛，於是李德裕既緣此而與穆宗長慶三年（830）的宰相名位擦身而過，惟迄至大和七年（833），方以西川功業詔入為兵部尚書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躋登宰輔，頗著政績。然則一年後，復以牛黨中人鄭注、李訓與內宦王守澄聯手毀謗傾軋，遂於大和八年（834）冬再度以鎮海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等職再度謫放浙地，⁸此即李德裕首次登相與罷相的歷史梗概。然則李德裕即緣於首次罷相期間的輾轉異動與因緣際會，遂有路過江西陶潛舊居及其巡禮追憶的仕宦行旅，從而促成李德裕以辭賦初次揭啟與陶潛對話的文學序幕，其中重要意義之一則在此宜為中國歷史上宰相以辭賦書寫展開陶潛巡禮的首要案例，而其書寫背後亦復涉及中、晚唐朋黨、宦官，甚至藩鎮的史學論述，從而映現唐代賦學與史學互涉的文化意蘊。由是觀之，李德裕辭賦之歸園書寫及其陶潛對話，誠為考察作者南楚罷相時期情志脈動與文類策略的重要具體途徑。

二、李德裕辭賦創作及其文化觀照

就唐代科舉制度大體而言，詩賦乃為進士科的重要科考項目，具備指標意義，而當時朝廷論議對於詩賦科考之風，易流衍而為士風浮薄虛華的商榷，遂成為反對詩賦科目及其進士出身人才的主要關鍵，其中李德裕亦嘗於呈奏唐武宗之論議中，提及其祖父李栖筠惡

⁵ 參見顧易生：〈顧況遊仙記與莽墟賦考釋〉，《顧易生文史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187。

⁶ 參見岑仲勉：《隋唐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87-192。

⁷ 同前註，頁392-397。

⁸ 參見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762-769。

斥進士之「祖尚浮華，不根藝實。」，其餘如時人趙匡亦論及進士科考：「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澆薄。」如是崇華棄實的士風疑慮誠爲當時朝廷士臣重要代表見解⁹。惟對於李德裕本人及其門第家世背景而言，他固非經由進士晉身仕宦，亦不乏論述士風崇華尚虛的流弊，然則史書雖據此載其「尤惡進士」，唯後人遂與當代牛、李黨爭之史事結合，甚至謂牛僧孺等大多出身進士科，而李德裕則代表門第出身之士，兩者分峙抗禮的朋黨紛爭，二者實力混爲一談¹⁰，且爲長久以來對於歷史事實集其人物情志的重大誤會。至少就李德裕而言，不僅任職宰相期間，曾擴大進士科的錄取名額，甚至亦不乏擢拔進士科出身的優秀人才，而他晚年被貶斥崖州之際，天下寒士爲之掬淚者，誠然不可勝數¹¹。凡此皆足以佐證李德裕並不以己身並非出自世族門第，而一味抑制進士，至於其高居宰輔之際，對於進士科考成例舊習的改革，亦著眼於制度與士風層面，並據以促進進士科考的公正合理，及進士形象的益趨提升，故其本質上絕非源自對於進士科考的主觀成見，更非取決於出身於門第與進士二者間的先天分野。

其次，就李德裕於唐文宗大和八年（834）罷相，迄至開成元年（836）夏北返洛陽平泉宅第的期間，李德裕的宦遊行旅固然大體可知，惟其內在的情志脈動及其心靈取向究竟爲何？史家的載紀幾乎付之闕如，所幸他在這一期間除了留傳零星篇詩文，即〈夏晚有懷平泉林居〉、〈早秋龍興寺江亭閒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與初返洛陽的〈懷崧樓記〉、〈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等篇外，主要的創作精思乃殫竭於辭賦書寫，計有〈再至江南四首〉、〈袁州七首〉、〈袁州八首〉、〈北歸六首〉與初返洛陽的〈靈泉賦〉共二十六篇賦，佔其平生傳世三十二篇辭賦的四分之三以上，由此可見李德裕初次罷相並謫放於李唐國境之南期間，藉由辭賦抒發情志的文類取向及其文化意蘊。

李德裕罷相南楚之際，於書寫策略上選擇以辭賦文類爲主要載體，固然與屈〈騷〉的地理記憶與文化召喚息息相關，然而其中值得注意者，乃在李德裕之步登仕途，固然得力於其宰相世家的門第餘蔭，而與當時藉由詩賦等進士科考晉身的仕宦途徑大相逕庭，又李德裕對於講究過度聲律巧麗的律賦興趣缺缺，¹²惟其對一向標榜「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辭賦本色¹³，則自年少屆老成，可謂鍾愛一生：

⁹ 參見岑仲勉：《隋唐史》，同註6，頁184-187。

¹⁰ 同前註，頁394-400。

¹¹ 參見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26。

¹² 參見〔唐〕李德裕：〈文章論〉，《李德裕集校箋·外集》，卷3，頁672-673。其中評論六朝永明聲律謂：「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文旨而妙，豈以音韻爲病哉？……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而韻。」

¹³ 參見〔梁〕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詮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2，頁134。

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人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僅錄新舊文十卷進上。¹⁴

然則辭賦在李德裕心目中不僅深植情愫，並且嚴肅地視之為進可掄揚雍容，退可託喻忠怨的千秋文章與經國大業，故乃揭舉「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之辭賦宏旨，其中不僅得以略窺李德裕對於詩賦文學之重視與觀照，同時亦惟其展現宰相器業與士臣素養的具體文化¹⁵指標，適與史書對於宰相李德裕的胸懷宏識與蔚然文章的人物形象，表裡互應，例如：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¹⁶

此外，李德裕平生亦頗不乏獻賦諷諭，申闡示君規箴與盡節明主旨奧的歷史載敘，如其〈進瑞橘賦狀〉所稱「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黷宸扆，倍積兢惶。」¹⁷又於唐敬宗寶曆元年〈丹宸箴序〉所揭「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¹⁸由是觀之，李德裕誠以詩賦為文章之大者，故其〈文章論〉乃謂：

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¹⁹

其中既以《詩》、《騷》論文章，又謂「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則略窺李德裕於詩賦文章之文化觀照，則其罷相南楚期間，借重辭賦以明志，其中旨諦之一，宜源自李德裕對於辭賦宏旨的重視與尊崇；至於詩賦亦為當時進士科考的重點科目，出身門第高族的李德裕既如此重視辭賦文章，並引為平生得意之文學風雅，則其必不拘囿成見憎惡以詩賦文才見長的進士中人，亦可藉此略窺箇中消息。

辭賦誠為李德裕平生文章風采的重要示現，然而對於初次遭逢罷相困境的他而言，南楚地理與屈〈騷〉文化的歷史召喚，必然很難無動於衷，事實上不一而足的騷體賦篇，及

¹⁴ 〔唐〕李德裕：〈進新舊文十卷狀〉，《李德裕集校箋·別集》，卷18，頁439。

¹⁵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同前註，卷2，頁428。

¹⁶ 〔後晉〕劉昫：《舊唐書·李德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66，頁4509。

¹⁷ 〔唐〕李德裕：〈進瑞橘賦狀〉，《李德裕集校箋》，卷18，頁350。

¹⁸ 〔唐〕李德裕：〈丹宸箴序〉，《李德裕集校箋·別集》，卷8，頁556。

¹⁹ 〔唐〕李德裕：〈文章論〉，同註12。

其濃郁的香草美人之思，仍然大量瀰漫於此一時期的辭賦作品中，從而展現其謫遷逐臣的戀戀京城及其君子悲思，例如再至〈江南四首〉中的〈白芙蓉賦〉與〈重臺芙蓉賦〉皆以蓮德指涉直臣正士之獨立不流，卻反罹謫斥的忠怨愁歎，例如：

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披妍姿之昭灼，待風雨之消散。乃為歌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²⁰

如是藉由辭賦書寫寓寄作者罷相南楚的香草美人之思，誠為李德裕輾轉遷謫於李唐國境之南的情志基調，其中值得留意者，乃在濃郁的屈〈騷〉逐臣情懷之下，卻潛藏著兩種內在游移且相互競逐的情志脈動：一為罷相南摘的遠遊想望；另一則為放逐困境的歸田焦慮。從而映現其辭賦中擬〈騷〉與慕陶互見的書寫取向。

李德裕南楚辭賦的憂遊書寫，基本上複製了屈〈騷〉的情志建構範式，從〈白芙蓉賦〉、〈重臺芙蓉賦〉，迄至文宗開成元年暮春所撰〈二芳叢賦〉的香草美人書寫，最能具體而微地映現此間罷相書寫的前後情志嬗變，及其企思憂遊的擬〈騷〉書寫：

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嗟衰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況鱗悲失浪，羽畏虛彈。有揚朱之危涕，無越石之暫懽。……思欲揖金膏而駐魄，攀珠樹而輟餐。顧人間之華艷，何足憂賞而盤桓。²¹

李德裕由浙西到袁州的輾轉謫遷，不僅深化其「楚澤放臣」的自我凝視，卻同時衍生其追慕淮南小山仙道之思的困境憂遊意圖，其中「嗟衰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的遲暮焦慮，儼然推波助瀾地催生李德裕企慕仙道，遺棄人間的人生沈思。

由是觀之，李德裕罷相南楚的主要期間，呈現〈再至江南四首〉迄至〈袁州七首〉、〈袁州八首〉的密集辭賦書寫，其中除了香草美人之思的屈〈騷〉擬寫基調外，雖然未見作者有具體明顯的慕陶書寫，卻已頗不乏對於宦海人生展開驀然回首的省思與論述，例如於大和八年冬罷相初始，重任浙西所撰的〈再至江南四首〉之〈通犀帶賦〉，即藉由深具金玉雕飾之美的通犀帶，寓託人生禍福之機，例如：

²⁰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李德裕集校箋·別集》，卷1，頁401-402。

²¹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同前註，卷2，頁434。

君子以良玉此德，室不以溫潤而近人。……匠者以其靈可禦邪，光能遠燭，剪截本末，發揮藻縟；……析以為帶，加之盛服。御之則裋身，褫之則韞櫝。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先哲所以聞象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²²

再任浙西觀察使的李德裕，緣於罷相南楚，故〈通犀帶賦〉之字裡行間，儼然流露自身未能居高思危與臨淵履薄的追悔自責。至於撰於再貶袁州的辭賦書寫，在屈〈騷〉忠怨之思外，顯然強化並深化對宦海浮沉與懷祿耽寵的人生思辨，於是以佳禽麗鳥與羅網籠籬為喻的〈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雖未高揭其慕陶之書寫大纛，實質上卻已然揭啓其與前賢陶潛仕宦書寫的人生對話。

三、〈山鳳凰賦〉、〈孔雀尾賦〉的仕宦困境及其陶潛對話

李德裕〈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的禽鳥形象，固然仍深根植於屈〈騷〉「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²³的比興旨諦，但作者的書寫變創乃在將屈〈騷〉君子貞士的禽鳥隱喻，融鑄於陶潛田園書寫世界裡，從而以亟欲掙脫仕宦籠並重返天地的禽鳥意象，在擬〈騷〉與效〈陶〉相互競合的書寫策略裡，形塑其超越罷相困境與放臣悲劇的新變文學隱喻。

陶潛筆下的飛鳥意象，本為其「徘徊／回歸」文學主題創新特色的具體註腳，²⁴其中行役宦遊之歎，誠為其歸返田園的重要情志關鍵，²⁵而其詩文亦經常出之以飛鳥意象，指涉其內心渴望擺脫樊籠，鳶飛魚躍般重返自然的生命姿態，於是此起彼落的禽鳥書寫遂化身為陶氏文學世界裡，遠離仕宦場域，重拾心靈自由的重要隱喻，例如：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²⁶

²² 〔唐〕李德裕：〈通犀帶賦〉，同前註，卷1，頁402-403。

²³ 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3。

²⁴ 有關陶潛「徘徊—回歸」主題的論述，可參見袁行霈：〈陶詩主題的創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09-112。

²⁵ 參見王國瓔：〈陶詩中的宦遊之歎〉，《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同註1，頁50-61。

²⁶ 〔晉〕陶潛：〈歸園田居五首其一〉，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卷2，頁40。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²⁷

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²⁸

而〈歸鳥〉則為陶氏集中體現其遠棄天路，與避逃羅網的歸隱旨趣，故謂：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則林標。……矰繳奚施，已卷安勞。²⁹

如是「豈思天路，欣返舊棲。」³⁰的歸返旨趣，誠與其〈感士不遇賦〉所謂「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³¹互為表裏。

陶潛〈感士不遇賦〉雖撰於作者辭退彭澤縣令後所撰，³²卻是作者四首仕宦生涯恍若魚網鳥羅及其逃祿歸耕的重要情志見證，並且較諸其詩歌文類之歸田書寫，益形詳瞻分明，並與〈歸去來辭〉成為陶潛歸田書寫的辭賦雙璧。

陶潛〈歸去來辭〉固以擺脫仕宦羅網之姿，鋪陳其對未來歸田生活的樂園虛擬及其夢幻藍圖為重要旨趣，³³但其中誠頗不乏回首宦海之昨非今是與迷途知返的情志脈動，例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返。」既成為作者逃祿歸田的詩意隱喻。然則歸鳥之倦飛知返，其中重要關鍵究竟何在？顯然〈歸去來辭〉並未明白提供具體答案，而惟以「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淡筆帶過，故令讀者終難以管窺其中主要緣由，所幸繼踵而撰的〈感士不遇賦〉彌補此一缺憾，其中「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既成陶潛「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的仕宦指涉及其人生註腳，另一方面亦復為其承傳屈〈騷〉旨奧迄至歸田書寫轉化的重要文學符碼與情志樞紐，此則允為陶潛辭賦源出屈〈騷〉比興，卻又獨出機杼，加以變創的重要脈絡，故其以「感士不遇」為題，固已透露箇中消息，而此賦反覆鋪陳的屈〈騷〉身影，益每每形諸字裡行間，例如：

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

²⁷ [晉]陶潛：〈連雨獨飲〉，同前註，卷2，頁55。

²⁸ [晉]陶潛：〈使作鎮軍參均經曲阿〉，同前註，卷3，頁71。

²⁹ [晉]陶潛：〈歸鳥〉，同前註，卷1，頁33。

³⁰ 同前註。

³¹ [晉]陶潛〈感士不遇賦〉，同前註，卷5，頁147。

³² 據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46。謂此賦「約寫於義熙二年（406），陶淵明42歲，彭澤歸田後之次年。」

³³ 參見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論陶、柳辭賦之歸田書寫及其文類流變〉，《漢學研究》卷22第1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4），頁47-80。

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³⁴

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貪。……雖好學而行義，何死生之苦辛。……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³⁵

由是觀之，陶潛辭賦之歸田書寫，誠可藉由〈感士不遇賦〉與〈歸去來辭〉的彼此對讀及其干涉互補裡，具體浮現其源自屈〈騷〉與轉入歸田的重要書寫變創及其情志脈絡。

上述陶潛辭賦雙璧所建構的歸田論述及其文學隱喻，其實亦如出一轍地再現於李德裕罷相南楚的辭賦書寫。其中〈再至江南四首〉固然富饒屈〈騷〉香草美人之思，對於初罹人生空前罷相挫折的李德裕而言，此時回首仕宦之路，誠不免於怵目驚心之餘，觸動不如歸去的田園慕陶之思，並且亦藉由慕陶效陶的辭賦書寫，禽鳥羅網之重要文學隱喻，展現其面對宦海浮沉的人生困境，及其躊躇忐忑與焦慮遊移的歸田想望。於是從以芙蓉為主要題材的〈再至江南〉書寫，臻至轉入以禽鳥為命意所在的〈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適足勾勒出李德裕辭賦由屈〈騷〉出發，漸次轉進陶賦的內在情志動線，及其辭賦藉由物我觀照所展現的歷史召喚及其文化對話，並從而揭示其中所涵攝的自我凝視，亦即李德裕辭賦世界所深刻映現由放臣、遊客迄至歸人的前後身份轉換及其困境焦慮。

撰於袁州謫遷時期的〈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兩篇，大體可以視為李德裕由屈〈騷〉花木禽鳥比興，寢漸轉進陶潛歸田書寫的重要轉捩點，故兩篇禽鳥賦篇中的羅網牢籠書寫，皆一一指涉作者以「愛惜毛羽，重於身命」的鳳凰自喻君子貞臣，及其蒙謗遭讒的仕宦困境與迷途省思。故其賦肇始於屈〈騷〉的善禽比興，作為李德裕緬懷昨日自我之宰相風華及其潔己好脩美士的文學寫真，如其自序文謂：

有麗鳥殊色，文如縟綉，邑人呼為山鳳凰。愛惜毛羽，重於身命，雖遭矰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³⁶

然則如是「懿靈山之岑寂，寔珍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混赤霄而一色，與白日而增輝。」³⁷的鳳凰美士，卒亦難以逃脫於宦海風波與仕途牢籠之摧殘戕害，於是緣

³⁴ 〔晉〕陶潛：〈感士不遇賦〉，《陶淵明集》，卷5，頁147。

³⁵ 同前註，頁148。

³⁶ 〔唐〕李德裕：〈山鳳凰賦〉，《李德裕集校箋·別集》，卷1，頁410。

³⁷ 同前註。

於如是罷相困境之驀然回首及其迷途驚夢，李德裕藉由辭賦之體物寫志，進行其仕宦人生的重新省思及其定位，作為罷相解嘲，與面對不可預知未來自我惕勵的重要座右銘：

既而衡網高懸，虞人合圍；身挂纖繳，足履駭機。畏采毛之摧落，不凌厲而奮飛。乃知玉之敗也，以致其瓊弁；翠之焚也，猶襲其寶衣。何異夫懷祿耽寵，樂而忘歸。玩軒冕而不去，惜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譏。

38

李德裕既以功業名器位極人臣的宰相際遇，尚且如此，則宦海風波之險惡逼人可知，緣是觀照，故其在另一篇以禽鳥命題的〈孔雀尾賦〉，即藉由「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絜空籠，與翠尾皆至。」籠中孔雀之死的悲劇，觸發貞臣俊士不免身蹈謫放南楚，甚至瀕臨危亡幽谷的士宦危機，故其賦謂：

攜珍禽以贈余，諒有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險巖。念未飛之眾雛，懷獨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安翼而長辭。異黃鵠之高翔，皆空籠而載馳。想綵羽而不見，覩修尾而增悲。……嗟絳冕之寄身，與鍛翮而一槩。雖暫榮而可愛，終以飾而賈害。³⁹

此賦與〈山鳳凰賦〉皆以「貴乎羽儀」或「愛其毛羽」的俊才好脩的貞臣美士自喻，然而一旦誤涉宦海風波，則如鳥陷羅網，終困牢籠，沉墮生死邊陲的幽黯煉獄，誠為李德裕面對罷相震懾及其人生困境的沉思。

以鳳凰、孔雀禽鳥隱喻貞臣美士不遇的書寫脈絡，固然深刻映現其禽鳥賦中的屈〈騷〉身影，惟李德裕終究並未抉擇屈〈騷〉：「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人生路向，而是轉向前賢陶潛的人生觀照尋求借鏡，故其辭賦乃異曲同工歸旨於「懷祿耽寵」的「乘君子之器」或「絳冕之寄身」，將「與茲鳥而同譏」、「與鍛翮而一身」的仕宦諷諭與人生省思。由是觀之，李德裕初始面對罷相困境，亟欲超越生命焦慮，而其人生策略，大體乃是發軔南楚空間的屈〈騷〉的情志對話裡，達成「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書寫旨諦；相形之下，李德裕〈山鳳凰賦〉、〈孔雀尾賦〉以網羅牢籠為喻的禽鳥論述及其宦海諷諭，其中則顯然具體融注了陶潛歸田書寫的生命情懷及其意象符碼。因此儘管日後李德裕的宰相人生仍然盪漾著浮沉起伏的宦海浪潮，然則從其罷相南楚所撰兩篇禽鳥賦觀之，由屈〈騷〉到陶〈賦〉的情志脈動

³⁸ 同前註。

³⁹ 同前註，頁 411-412

及其罷相焦慮，顯然成為北歸田園夢想的書寫序幕，並且藉由辭賦文類的內在對話，具體啟動其慕陶效陶書寫的文學列車，從而映現李德裕南楚辭賦物我觀照下的歷史文化巡禮，及其游移於宰相、放臣、歸人三者之間的自我身分凝視與困境焦慮。

此外，李德裕〈袁州七首〉的另一篇辭賦〈振鷺賦〉，雖與〈山鳳凰賦〉、〈孔雀尾賦〉同以禽鳥命題，雖亦不乏自我寫真的書寫隱喻，然其身分指涉之異於前述兩賦者，乃在前者基本上仍難擺脫屈〈騷〉餘影，並且意圖向陶〈賦〉取經，以超越罷相南楚的人生困境，其中屈〈騷〉與陶〈賦〉二者誠以競合之姿，代言了李德裕當時飄流於放臣與歸人彼此交錯的文化認同及其自我凝視，相形之下，〈振鷺賦〉基本上擺脫屈〈騷〉的濃郁放臣陰影，化身為翩然來去，無心去留意圖擺脫仕宦困境，追尋自適自得，歸返大自然生命基調的飛鳥之樂：

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歎美羽之翩翩，感余生之憂慄。……陋汀葭之靡靡，棲岸竹之青青。……悲夫綠篠枝弱，巢非多據。……豈不知陂澤可宿，荊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立漣漪，意態閑暇，羽毛袵襪。……隱青以延佇，若田父之輟輻。重曰：振鷺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去留。⁴⁰

其中的書寫基調，乃藉白鷺鳥的擇巢而居，惡居下流，高飛滄洲，以追尋「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去留。」從而遠離深陷「搏獸之當路」生命憂危困境，然則李德裕如是的人生沉思，顯然乃源自南楚罷相，接踵謫遷之困境，故由振鷺于飛及其「遊止有度，不疾不徐」的自然風景及其生命底蘊裡，觸發「歎美羽之翩翩，感于生之憂慄。」的歸田想望。並且所述滄洲歸隱旨趣，誠與陶潛〈歸去來辭〉所揭「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的「平生之志」，及其洞燭宦海風波如恢張於天地之間的羅網牢籠，遂有「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的生命省悟，從而歸旨於「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⁴¹的田園人生。據此得以略窺〈振鷺賦〉已淡化〈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裡猶自沉重的屈〈騷〉餘影，轉而在「振鷺于飛，于彼滄洲」的振翅高飛與仕途迷途書寫裡漸次飛向陶潛歸田的精神國度，從而映現其罷相南楚，謫遷袁州時期由屈〈騷〉通往陶陶賦的情志脈動，及其始於放臣，卻漸萌歸人之思的慕陶效陶進路。因此，上述李德裕〈袁州七首〉同以禽鳥為題的三篇辭賦，其中〈山鳳凰賦〉與〈孔雀尾賦〉雖已開始啟動與前賢陶潛對話的書寫行動及其文類筆略，

⁴⁰ 同前註，頁 419-420。

⁴¹ 〔晉〕陶潛：〈歸去來辭〉，《陶淵明集》，頁 161。

然濃郁的香草美人之思，畢竟形成屈〈騷〉與陶賦二者彼此競合的情志向度，若對照於陶潛〈感士不遇賦〉與〈歸去來辭〉情志基調的異趨性而言，〈山鳳凰賦〉、〈孔雀賦〉大體旨趣以「士不遇」為主，〈歸去來辭〉為輔，其中雖不乏萌生歸田之念的相關情志鋪陳，終竟明而未融；相形之下〈振鷺賦〉則擺脫前者賦篇中以羅罔牢籠及其禁錮下的禽鳥隱喻，及其宦海論述，大肆展開自適遐曠於無心去留的歸田姿態，並高揭其「振鷺于飛，于彼滄洲。」的「質性自然」追尋，顯然淡化其罷相南楚的放臣身影，並漸次轉向田園隱論之思的歸人圖景，於是袁州辭賦的禽鳥書寫遂成為李德裕展開由擬〈騷〉臻至慕陶巡禮的文學儀式及其心靈見證。

四、〈問泉途賦〉的陶潛召喚及其名節困境

〈問泉途賦〉為李德裕袁州謫居期間〈袁州八首〉辭賦系列之首篇，據作者自序撰寫動機實緣於追憶前翰林院同僚沈傳師，並興發人生慨思所撰，遂有感於前賢陶潛云云的人生論述：

問泉途，思沈侯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艱險，多言可畏，故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何如亡耳！陶靖節亦侑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⁴²

李德裕〈問泉途賦序〉，主要藉由故友沈侯「人世艱險，多言可畏，乃以山水賞心樂其志性的平生追憶，展開其與前賢尚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與陶潛「人生實難」所召喚的人生對話。其中論述旨諦主要有二，即（一）兼濟與自適（二）讒謗與名節。故作者乃以陶、謝為喻，指涉昔日二人由翰林院前後外放，所謂「君聳駕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其間固皆「欲極山水之閒泛，盡人生之樂康。」但另一方面，賦感於「雖爵服之已貴，何憂思之未忘。」的人生困惑，亦即陷入兼濟與自適難以兩全的仕宦困境，換言之，追尋兼濟志業與行樂自適之間，顯然成為李德裕罷相袁州期間的人生焦慮，故而觸發「問冥昧於故人」的書寫動機，所謂：

或曰生特在於行樂，死何用於虛謚？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

⁴² 〔唐〕李德裕：〈問泉途賦〉，《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1。

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⁴³

如是的仕宦省思及其人生觀照，固為作者引述尚子平、陶潛前賢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與「人生實難」之一主要旨奧，其中誠然蘊涵作者固罷相南楚的不遇之悲及其人生沉思，然則面對富貴貧賤，宿志不遇等涉及兼濟與自適的人生命題，而形諸文字，亦見諸前賢陶潛的〈感士不遇賦〉裡，例如：

或擊壤以自觀，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感哲人之無偶，淋浪以灑袂。……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又貧。……雖好學而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⁴⁴

陶潛此賦揭示「病奇名之不立」與「好學而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的天理人事困惑，並歸旨於「蒼冥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的士人不遇悲劇，從而抉擇君子名節及其固窮自適的歸田人生觀照：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拙，且欣然而歸止。永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⁴⁵

陶潛有感而發的〈士不遇賦〉，其中固然歷經游移於兼濟與自適之間的人生困境，惟其終以非常魄力作出護航生命自由的士人抉擇，⁴⁶適如其在〈祭從弟敬遠文〉之自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議。」⁴⁷然則據此對照李德裕面對陶潛等前賢與故友沈傳師的人生論述，顯然已深陷「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的徬徨與困惑，卻從而映現作者罷相南楚期間的陶潛召喚及其人生困境。惟李德裕〈問泉途賦〉固然不乏緣自仕宦不遇的「兼濟與自適」困境思辯，並興發訪效陶潛「斂策歸來」的隱論想望，從而以君子固窮之道，維繫君子名節，然而李德裕之所以舉棋不定異於陶潛之毅然抉擇歸田者，由此賦觀之，其關鍵乃在作者對於其蒙受罷相南楚，復遷袁州的讒謗之禍，深覺痛心疾首，故謂：

⁴³ 同前註，頁 422。

⁴⁴ 〔晉〕陶潛：〈感士不遇賦〉，《陶淵明集》，卷 5，頁 147-148。

⁴⁵ 同前註，頁 148。

⁴⁶ 參見方瑜：〈抉擇·自由·創造——論東坡筆下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0），頁 259。

⁴⁷ 〔晉〕陶潛：〈祭從弟敬遠文〉，《陶淵明集》，卷 7，頁 194。

余聞神之清者，上為列真，...故無傷於道窮。⁴⁸

由是觀之，李德裕對於朝廷群少落井下石的謗讒手段，顯然殊難釋懷，其中理由之一，應在其事毀及作者立身名節。又何況謗讒之恥本為古今貞士不遇的之一重要根源，故即使徵諸陶潛歸田次年所撰之〈感士不遇賦〉，亦頗申奇義，例如：

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志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⁴⁹

可見謗讒之禍，古今凡以名節自重的貞士必見深惡痛絕，陶潛〈感士不遇賦〉既頗伸慨思於前，而李德裕〈問泉途賦〉亦屢伸不已，此外，對於憂心社稷與身繫天下的宰相李德裕而言，謗讒之禍，不僅攸關士人名譽，更為君國治道之大忌。故他早在文宗大和七、八年間初任宰輔之際，即已依據憲宗朝令狐楚《元和辨謗略》十卷，重新增刪改定，並與集賢學士裴潏呈奏〈大和新修辨謗略序〉謂：

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為不才所忌，有功為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況偽必亂真，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誠雷之蚊，未響而先合。以群陰而蔽孤陽，以眾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測深慮遠，取為殷鑑，……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⁵⁰

據此足見李德裕對於攸關朝廷綱紀與士臣名節的讒謗巨患，深切著名與論辯之苦心孤詣，然而天理難測，他本人亦緣此而罷相南謫，故〈問泉途賦〉之痛斥讒謗，既憤指「孤讒人沒於泉下，不得同於物化。」復感慨系之地歸束於「苟不罹於此患，故無傷於道窮。」則此意亦措意於讒謗與君子名節之義，可謂昭然若揭。亦其平生於宰相功業之外，「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的情志見證，然則此宜為其賦序文引陶潛「人生實難」之歎的重要

⁴⁸ [唐]李德裕：〈問泉途賦〉，《李德裕集校箋》，頁422。

⁴⁹ [晉]陶潛：〈感士不遇賦〉，《陶淵明集》，頁147。

⁵⁰ [唐]李德裕〈大和新修辨謗略序〉，《李德裕集校箋》，頁722。

命意所在，亦適可與陶潛晚年所撰〈自祭文〉中的君子名節論述及其前後呼應的生死觀照：

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比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⁵¹

由是觀之，李德裕的罷相南楚故迴異於陶潛棄官歸田，然而藉由陶潛〈士不遇賦〉迄至〈自祭文〉裡所揭露的仕宦困境及其人生沉思，則化身而為李德裕〈問泉途賦〉的歷史召喚與文化追憶，並主要藉由「兼濟與自適」、「讒謗與名節」的士人向度，一一叩問李德裕放臣與歸人二者彼我競合的內在心靈扉頁。

五、〈傷年賦〉、〈畏途賦〉、〈知止賦〉之遲暮焦慮與田園歸去

對於遭遇罷相挫折，復又再遷袁州的李德裕而言，如何從初始濃郁糾結之逐臣陰影走出，誠為其南楚謫遷辭賦書寫的重要情志脈動，其中袁州實其所撰的〈袁州七首〉與〈袁州八首〉如前文所述，及頗不乏作者游移躊躇於屈〈騷〉與陶潛兩種前賢情志範式的心靈軌跡，而〈傷年賦〉則為其袁州辭賦系列中由屈〈騷〉餘影書寫基調，轉化而為大肆以陶潛歸田為重心的書寫關鍵及其情志見證，從而以辭賦書寫宣告李德裕已然在前賢陶潛的召喚裡，終得大體揮除的逐臣陰霾，重現並迎向陶潛歸田旨趣的心靈曙光，並且此一重大情志轉向及其典範內化，誠然復與作者南楚謫遷生涯的體衰年邁之感息息攸關，於是陶潛歸田的追憶書寫遂一一化身為李德裕殷盼終止謫遷北歸洛陽的謫臣焦慮，適如其〈傷年賦·序〉所謂：

余茲年五十，久嬰沈痼，楚澤卑濕，杳無歸期。恐田園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為此賦。⁵²

足見袁州時期李德裕逐臣怨望之情，已然漸次遠颺淡化，並代之以宦情觀照與人生省思，故其間不少體物書寫之賦，如〈袁州七首〉系列的〈積薪賦〉、〈敬器賦〉、〈智囊賦〉等篇，皆主要圍繞此一書寫旨趣。於是〈傷年賦〉乃成為其洞燭仕途宦海的風詭雲譎，轉而效慕

⁵¹ 〔晉〕陶潛：〈自祭文〉，《陶淵明集》，頁197。

⁵² 〔唐〕李德裕：〈傷年賦〉，《李德裕集校箋·別集》，卷2，頁423。

陶潛歸田人生風範的情志鋪陳及其心靈隱喻，並且此賦所映現的陶潛仕隱觀照及其生命典律，適為李德裕的面對罷相困境與仕宦悔咎之際，轉向士人文化傳統問津與取經的主要範本，並從中尋求其歷史對話與自我救贖的人生出路。故作者賦乃藉由主客問答的辭賦書寫慣例，大肆演繹其效法陶潛歸田情志的轉折：

嗟世路之險隘，矧驚駘之已疲。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違。……幸回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盈難久持。李耽寵而忘返，豈黃犬之可思。種嬰患而且悟，眇蒼波而莫追。隽畏勢而自引，非爵羅之所羈。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⁵³

其中可見作者的陶潛歸田幻夢正緣自南楚罷相的逐臣焦慮，於是何時得以幸蒙寵召北歸洛陽家園，由逐臣化身為歸人之姿，遂一一藉由陶潛〈歸去來辭〉的重新演繹，以脫胎奪換之創作句法，寄寓其心繫家國，殷望北歸的深層底蘊。故〈傷年賦〉頗不乏此起彼落掇襲於〈歸去來辭〉話語及其意趣的類似表述，例如：

怨田園將蕪。
邈故園之寥遠，念歸途之未期。故稚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洟。
幸回車之未晚。
既已覺於今是，豈惶惶於路岐。⁵⁴

對照於陶潛〈歸去來辭〉，可知李德裕此賦的歸田論述，誠然主要取義於〈歸去來辭〉開宗明義的首揭旨諦：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⁵⁵

換言之，李德裕〈傷年賦〉始於「恐田園將蕪」，終以「既已覺於今是，豈惶惶於路岐。」田書寫，實為取則陶潛〈歸去來辭〉篇首基調的隱括及其變創，然則〈傷年賦〉雖以「美人遲暮」為題，似乎猶自指涉屈〈騷〉的放臣怨慕之思，但質實言之，則主要出之以〈歸

⁵³ 同前註，頁 423-424。

⁵⁴ 以上諸例，參見〈傷年賦〉，同前註，頁 423-424。

⁵⁵ 〔晉〕陶潛：〈歸去來辭〉，《陶淵明集》，卷 5，頁 160。

去來辭〉的範式，從而展現其善於鑄鑄歷史事類與文學典故的文章觀照。⁵⁶

李德裕〈傷年賦〉緣自罷相困境與人生遲暮歸田書寫，前賢陶潛典範固然成為其南謫迄至北歸的焦慮隱喻，而文宗開成元年暮春三月之際，宛如枯木逢春地得以由袁州北徙滁州，據史書載敘乃因「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⁵⁷此一轉變無疑地宣告罷相南楚的李德裕〈傷年賦〉的北歸夢幻，終得一掃長久以來的罷相陰霾，其中由袁州到滁州的宦遊空間移動，正意謂著李德裕的北歸途景不再只是書寫咄咄的心靈隱喻，而是即將一一落實的人生憧憬，於是遠颺袁州謫遷夢魘的〈北歸六首〉辭賦，遂為其歸田心靈的文學見證及其人生宣示，其中主要體現在〈畏途賦〉與〈知止賦〉。

〈畏途賦〉固然撰於開成元年孟夏，作者由袁州前往滁州之際，因力排眾議重蹈蠡澤之水道，從而憶及當日涉越潯陽不測之川從而感慨系之的心路 轉折，固其序文謂：

乙卯歲孟夏，余俟最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居于蠡澤，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不揮淚。今明王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轅而隆者，因答此賦。⁵⁸

由是可見作者主要在昔時輾轉謫遷，行旅於畏途險川及其死生邊界的放逐巡禮，從而在放臣與歸人彼此轉換的自我凝視裡，重新思考李宰相人生的宦海浮沉及其仕隱出處，其中即大肆藉由陶潛故里舊居的拜訪巡禮，鋪陳其終陷軒冕之累，未及早悟前賢歸田之道的罷相困境，例如：

余以軒冕來寄，廟堂非據，賀客旋軫，吊賓在戶。自淮服而載馳，慣岷山而上泝。……于時行潦猥至，百川皆注。望九派而無濟，橫扁舟而徑度。非之漁父之勇，已忘胥靡之懼。⁵⁹

訪潯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樽之遙奠，悲三徑之久蕪。當其辭簪組返蓬蘆。逸妻賓敬，稚子歡娛。臨流賦詩，臥壑觀書。對南山之幽靄，蔭嘉木之挾疏。不為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寤，居一世之不如。⁶⁰

⁵⁶ 參見〔唐〕李德裕：〈文章論〉，同註12。謂：「世有非文章者，曰……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

⁵⁷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80，頁5344。

⁵⁸ 〔唐〕李德裕：〈畏途賦〉，《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5。

⁵⁹ 同前註。

⁶⁰ 同前註，頁435-436。

其中有關歸田的鋪陳敘寫，顯然即主要隱括自陶潛〈歸去來辭〉，例如「悲三徑之久蕪」乃奪胎換骨於「田園將蕪」與「三徑就荒」；「稚子歡娛」取義自「僮僕歡迎，稚子候門。」；「臨流賦詩」則更提煉自陶潛辭賦「臨清流而賦詩」的成句。可見作為李德裕〈北歸六首〉書寫首篇的〈畏途賦〉，已然開宗名義地高揭以陶潛〈歸去來辭〉為典律的情志大纛，作為其揮散昨日罷相迷霧，殷望北歸洛陽，重見天日的心靈告白。由是觀之，陶潛歸田適成李德裕仕宦悔咎的文化召喚與歷史圖騰；並且以「夫子之早寤」的先行者之姿，在鐘鼎與山林絡繹不絕古代的仕隱行列裡，聯袂演繹士人出處進退之際的中庸王道，其中陶潛即為作者效慕的首要典範，從而揭櫫作者〈知止賦〉的主要旨趣，故其序文謂：

古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險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春秋至兩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為此賦。⁶¹

足見以辭賦書寫寓寄宦海浮沉及其人生省思的李德裕，善於運用其歷史關讀的豐富知識，作為其沉澱挫折與超越困境的重要憑恃，故當其緬懷古代先哲群體仕隱進退之道，並從中推許陶潛的歸田範式，其中固然不乏作者緣於丘山之愛，從而引為同調；另一方面亦展現其逞才示學，精思淵博通貫古今的宰相器識，誠如史家筆下李德裕的人物寫真所謂：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華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于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徙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游，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御臣要略〉……〈獻替錄〉行於世。⁶²

由是觀之，李德裕辭賦中每每展現人物鋪陳，固然與其器業不群博學深思的士臣形象互契，然其中獨尤推慕前賢陶潛，實亦與南楚罷相的宦海風波及其困境體驗攸關，尤其以〈歸去來辭〉為歸田代表典律，更化身為李德裕謫遷李唐國境之南期間，由初始放臣焦慮臻至歸田召喚的重要文化圖騰與書寫經典，適如〈知止賦〉此起彼落先哲「自春秋至西漢」的仕隱群相裡，陶潛返而成為作者初始設定範疇之外的首要人物指標，賦正文即首揭「觀陽秋

⁶¹ 〔唐〕李德裕：〈知止賦〉，《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7。

⁶² 〔後晉〕劉昫：《舊唐書·李德裕傳》，卷166，頁4509。

與漢冊，求知止知大夫。」之書寫大纛，故此下一一魚貫而出的代表歷史人物，遂成為作者鋪陳寫志，並展現淵博才學的主要依據，例如「魯莽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猶歎行藏已與顏，稱卷舒而善蘧。」、「在漢留侯，與道為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⁶³等等皆為此賦展開知止先哲之歷史巡禮的重要典範。唯李德裕藉由如是勇於知止的歷史人物敘寫，主要作為其罷相南楚，終獲北歸之際，回首過往宰相浮沉人生的自我悔咎及其解嘲的歷史人物鏡象，其中固宜深具史鑑與人生的彼此對照意涵，亦從而映現李德裕賦學與史學互涉之一向度。此外，另一值得關注者，乃為作者「自春秋至西漢」知止先哲人物風標敘寫之後，反以更多篇幅大肆鋪陳其即將告別罷相南楚之幽暗歲月，迎向暖春嶄新扉頁的人生定位及其展望，於是漢、晉以來的歸田前賢，遂在其辭賦書寫的文化巡禮中登場：

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回駕於迷途。況乎托北阜以為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既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⁶⁴

其中所指涉的漢晉前賢，依序包括應璩、左思、仲長統、陶潛。⁶⁵而作者由是展開歸田效慕的書寫鋪陳，其間固不乏因時制宜地穿插「春秋至西漢」之「淮侯種瓜」、「陶相灌蔬」、「尚遍遊於五嶽」、「蠡長往於五湖」的樂志風範，乃至於深陷心為形役與宦海悔咎的人物殷鑑：「李斯忌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⁶⁶唯其主要書寫脈絡則其具體建構在李德裕家園洛陽平泉山莊，與陶潛歸田圖景之書寫競合及其效慕合流：

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統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皋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徒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阪，或遵流於清渠，傲情人世之外，寄跡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故墟，□□遠而騰倚，鳬雁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⁶⁷

⁶³ [唐]李德裕：〈知止賦〉，同註61。

⁶⁴ 同前註，頁438。

⁶⁵ 據李德裕於賦句下注文謂：「應璩詩：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此以為宅。」、「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吾志。」，同前註，頁438。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同前註。

然則此一宰相家園與陶潛歸田的同化書寫，適為陶氏〈歸去來辭〉與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平泉山居草木記〉的具體縮影及其歸田人生的另一註腳，亦為其由袁州謫遷迄至北歸宦遊的情志見證與心靈驛站，故此賦之洛陽平泉家園敘寫即主要歸旨於陶潛棄仕隱論與耕讀樂志的士人歸田圖景，故謂：「昔有淮侯種瓜，陶潛灌蔬。竊此君子，亦能荷鋤。」並且以下一段生命樂園虛擬及其鋪陳，儼然即脫胎於陶潛〈歸去來辭〉及其相關田園書寫，由是觀之，撰於北歸之初的〈知止賦〉，已然顯著展現李德裕對於前此罷相困境及宦海畏途的惆悵追悔，從而藉由先哲陶潛的歸田典範，重新審思未來可能的生涯藍圖：

畫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耿光之未晚，期終老於桑榆。⁶⁸

然則陶潛辭官歸田以樂其志的士人田園圖景，固然緣自作者「質性自然，非矯厲可得。」的丘山之愛，此外而繫乎對於仕途宦海之昨非今是與迷途知返之思辨，為士人田園折返，自士人兼濟裡想則轉身而為自我生命及宗族延續的獨善價值追求，於是跳脫於出處進退仕宦文化框架的歸田人生，必然亦重新回歸先世祖德與家族倫理的守護傳衍，是陶潛所以有〈命子〉、〈責子〉與〈與子儼等疏〉一類深具士族門第文化與家訓規箴意涵之作，其中如〈命子〉即溯源陶唐，並迄至文祖慎終追遠的祖德垂憲及其人生風範，例如：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愜喜。⁶⁹

並且歸旨於作者對於子輩命名的苦心孤詣，及其背後祖德薪傳的家訓意蘊，故謂：

卜云嘉日，古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⁷⁰

據此觀照李德裕後之撰〈平泉山居子孫記〉，其中誠亦不乏陶潛上述祖德傳承的田園人生價值及其文化身影，故宜視為〈知止賦〉歸田論述的另一延展面向，故此記文，重申其歌頌知止歸田以樂志自適，並規戒其子孫：

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晉〕陶潛：〈命子〉，《陶淵明集》，頁28。

⁷⁰ 同前註，頁29。

多有遺恨。……矧吾者，於葵無衛族之智，楚雁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

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文所植也。⁷¹

則自視為陶潛歸田異代同調的生命樂園及其變創的平泉山居，顯然在李德裕目中乃是深具祖德薪傳與家訓承載等士族門第文化意涵的重要隱喻，故〈平泉山莊戒子孫記〉開宗明義高階「經始平泉，追先志也。」適為其書寫旨趣提供具體註腳，亦從而映現李德裕士族門第的出身背景及其文化身影。⁷²

六、結論：李德裕宰相人生的困境沈思與陶潛追憶

對於頻繁出入京邑的唐代宰相李德裕而言，大和七年春首登宰輔之位，固已屬遲來的仕途春暖，然而向以練才勳業為士臣風範的他，仍不免在中、晚唐朋黨與宦官聯袂傾軋的宦海風波失足沉浮，竟於大和八年冬罷相南楚。此一空前的挫折，誠然觸引李德裕的放逐之思，於是在南楚空間為觸媒的文化召喚之下，作為歷史典律及其情志範式的屈騷文化，顯然成為李德裕罷相南楚的主要書寫依據及其文類主體，尤其以香草美人之比興全貌為代表的文學特色，更化身為其初期文本與罷相辭賦的精神旨歸，唯此同時，李德裕此類南楚辭賦亦在濃郁的屈騷不遇及其逐臣情思中，展開其對於平生兼濟志業及其仕宦人生的重新回首凝視，於是取捨於仕、隱之際的傳統士人文化命題及其人生思辨，儼然成為李德裕當時辭賦書寫的另一中心旨趣，於是以陶潛歸田為典律的文學史典律，遂逐漸牽動李德裕南楚辭賦的書寫向度，加上接著又遭逢京邑廟堂中人群體謗讒的落井下石，於是再謫遷袁州的人生夢魘，終益深化李德裕對於官場譎詭不測的憂畏之情，加上如是繼踵而至的謫遷困境，一方面既深化他對於重回京邑怨望及其無期的歸返思慮，另一方面則益保身其再袁州的地理路線，與前賢陶潛故里潯陽的交會，於是李德裕遂興發前進巡禮之行；此外，加上此時的他正陷入仕、隱人生困惑後面臨北歸京城思慮等等罷相困境，於是以陶潛〈歸去來辭〉為典律的歸田書寫，遂水到渠成地一一潛躍飛沉於李德裕的辭賦世界及其情志脈動；其次化身為其罷相生涯荒漠國境的心靈甘泉，並從中汲取慰藉與救贖。李德裕南楚辭賦：初始於屈〈騷〉放逐文學對話，漸次轉化為陶潛歸田書寫效慕的主要內在情志驛動及其文

⁷¹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9，頁568-569。

⁷² 參見〔唐〕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箋·前言》，頁1-2。

學里程碑，其中並展現為始以宰相發軔，賡續放臣怨懟，終致歸人追夢的主要創作前後身段，於是結合宰相、放臣與歸人的前後書寫特色之律動與置換，誠為李德裕南楚罷相期間的重要心靈顯影及其情志見證，不僅為唐代史學有關他此一初次罷相時期的內在世界脈動及情志取向，提供彌補空闕的心靈扉頁；另一方面就唐代文學史或田園書寫史，甚至唐賦的陶潛巡禮及其歸田書寫流變與發展，提供一則別具參考價值的辭賦視域。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晉〕陶潛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梁〕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二、 近人論著

方瑜：〈抉擇·自由·創造——論東坡筆下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年，頁259。

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

岑仲勉：《隋唐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袁行霈：〈陶詩主題的創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論陶、柳辭賦之歸田書寫及其文類流變〉，《漢學研究》卷22第1期，2004年，頁47-80。

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顧易生：《顧易生文史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Prime Minister, Dilemma, Home: Li De Yu, as a Prime Minister, Who Write in the Form of “Ci Fu” to Savor the Mind of “Tao Qian” and the Recall

Dong-hai Hsu^{*}

Abstract

Li De Yu, as a Prime Minister, was the pioneer in the history who started to write in the form of “Ci Fu” to savor the mind of “Tao Qian.” With the writing of return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with Tao Qian, Li De Yu reflected his mind and emotion with Tao Qian during the recall. His emotional writing during the recall did not only enrich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g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history of pastoral with a “Ci Fu” case of reference value. It mirrors the deep culture meaning of intertextuality of “Fu Xue” of Tang Dynasty and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Tang Dynasty, Prime Minister, Li De Yu, Ci Fu, Tao Qia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